20世纪人口地理学研究进展

封志明[1], 李 鹏[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49)

摘 要:20世纪之前的人口地理学只是从属于传统地理学的人口地理研究。进入20世纪,人口地理研究尚未从人文地理学中独立出来,内容上延续了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思想;二战以后,人口地理研究逐步向人口地理学纵深发展,50年代人口地理学逐步成形。20世纪后半叶,人口地理学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出生率与老龄化、迁移与流动、人口与脆弱性等世界性人口问题成为热点研究主题。未来人口地理学家仍将关注人口差异、脆弱性及空间分析,加强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方法研究,从不同地理尺度与地理维度应对人口地理学的新挑战。

关 键 词:人口;人口地理;人口地理学;地理学;空间分析

人口地理学(Population Geography)研究与地方特性相关的人口分布、构成、迁移与增长的空间变化[1]。它是一门介于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间的边缘学科。人始终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要素之一,关注空间变化则是地理学家对人口研究的重要贡献。人口地理学着重于探讨各区域人口分布与人口变动的空间差异,分析其原因及预测未来的趋势,既与人口统计过程研究有关,又与人口(统计)学有所不同。20世纪以前,人口地理学只是完全从属于传统地理学的人口地理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口地理学才逐步形成,并走上持续快速发展道路。本文试图通过梳理人口地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认识人口地理学研究的过去与现在,以发掘人口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与未来方向。

1 20世纪以前的人口地理研究

人口地理学的形成始于西方国家。20世纪以前,欧洲国家(德国、法国)最早记叙或描述了与人口现象有关的人类活动,包括人口普查。特别是地理大发现拓宽了人类的地理认知视野,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移民;同时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频繁的航海探险与远洋贸易为地理学积累了大量详实的资料,如游记、地图和地理学著作。

16世纪,作为近代地理学的发源地,德国出版了第一本地理学著作《宇宙志》(1544)。17世纪中叶,地理学家瓦伦纽斯(B. Varenius)在《普通地理学》将地理学分为普通与专门两类,并在专门地理学部分描述了人口的出生、死亡等人文特征。这被认为是近代西方人口地理分析的开端。

19世纪初,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地理学家洪堡(A. von Humboldt)与李特尔(K. Ritter)分别在《墨西哥》与《欧洲地理》(1804-1807)中,详细论述了人口数量与分布,及其与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李特尔自181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地球学》中更强调人是整个地理研究的核心和重点,指出人的研究是地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之后,其他学者如瓦格纳(H. Wagner)与贝姆(E. Behm)出版了《世界人口》(1866),它由统计资料汇编而成;1860- 1869年,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两次来中国进行地理、地质考察,在《中国》中对人口、物产等进行了描述。后有学者认为李希霍芬的科学文献主要是关于人口地理学、经济等[2]。此外,开始出现围绕人种的描述,如佩歇尔(O. Pesohel)发表的《人种及其地理分布》(1876),讨论了人类体格与人种分类等问题。

人口地理学较为系统的研究,则始于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的两卷《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1882-1891),这被西方学者奉为人口地理学最早的经典之作。第一卷追溯了不同自然特征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第二卷以"人类的地理学的

收稿日期:2010-10; **修订日期**: 2011-01.
基金项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项目(201011)。
作者简介:封志明 (1963-),男,河北平山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农业资源高效发展研究,旁及资源科学的理论探讨。E-mail: fengzm@igsnrr.ac.cn

分布”做为副标题，系统论述了人类居住区域的概念、历史与界限。近代地理区域学派奠基人赫特纳(A. Hettner)1892年根据科迪勒拉山考察成果绘制了相应的人口密度图。他较早从人地关系角度分析人口或人类地理问题。由其学生H. 施米特黑纳整理并审订的《人的地理学基础》(Basis of the Geography of Man)则是其代表作之一。

其他国家如法、英两国的人口地理研究略晚于德国。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B. de 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The Spirit of Laws)(1748)首次分析了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同期，地理学家布丰(G. L. L. de Buffon)在《自然史：通论和专论》研究了人种统一的理论，并对人类在全世界的扩展方式、人的多样性及人口在地球上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人口密度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作了解释。

英国的人口问题研究最早见于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 R. Malthus)的《人口论》(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798)，对人口科学研究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不过，从地理学角度分析人口问题则是斯诺(J. Snow)。他根据1854年伦敦霍乱事件，利用制图方法揭示了人口分布的空间关系和人口统计学过程。之后有从人种角度开展对人的研究，如哈东(A. C. Haddon)的《对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1898)与基恩(A. H. Keane)的《人：过去与现在》(Man: Past and Present)(1899)。

中国历来是人口大国，又是文明发祥地之一。自《汉书·地理志》开始，人口记载资料颇丰，如历代史书、地理志与方志等，一些人口地理思想如人地平衡、移民实边等散见其中。另有学者对人口问题进行了探究，如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清朝洪亮吉与汪士铎分别著有《治平》与《乙丙日记》。但从地理学角度分析人口问题较少。

20世纪之前的人口地理研究多在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之下。早期学者通过考察搜集了大量地理事实，不仅系统地描述了不同区域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特征，而且也对一些人口地理思想、观点以及研究方法(因果分析)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人口数据是早期地理学者进行人口地理研究的主要前提之一。人口普查与探险考察则是同期最主要的人口数据来源。1749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定期人口普查的国家[3]。但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美国，之后法、英等国也开始了人口普查。

进入20世纪，受惠于工业革命，欧美主要国家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日益丰富，推动了人口地理研究的发展。但此时人口地理研究尚未从人文地理学中独立出来，内容上延续了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思想，同时发展、充实了人地关系的观点。二战后，随着世界人口问题的日益突出及经济、科技的发展，促使人口地理研究逐步向人口地理学科纵深发展。

人口地理学真正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受到重视，始于1953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会开幕上特里瓦撒(G. T. Trewartha)主席所作的关于《人口地理学实例》(A Case for Population Geography)的讲演。因此，我们以1953年作为20世纪人口地理学发展的分水岭，可以初步划分出人口地理学孕育与雏形及形成与发展两个阶段。

2 20世纪上半叶的人口地理学孕育与雏型发展

20世纪人口地理学能成为主要分支学科的前提之一是相关研究机构显著增加。特别是二战前后，影响较大的人口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如1928年人口科学研究国际联合会(IUSSP)在法国巴黎创立；1936与1939年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所与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成立；1945-1946年，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与联合国人口委员会先后成立；1952年在纽约成立了人口理事会，这是一个民间研究团体。同期有部分人口研究刊物相继问世，如《人口》(Population)、《人口索引》(Population Index)、《人口问题研究》(Journal of Population Problems)、《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等。

近代人文地理学源发于法国，人口地理学也有很深的渊源。地理学家白兰士(P.V. Blache)1917年发表的《世界人口的分布》论述了地球上人类的分布与密度。他研究世界人口分布现象及其原因，为人口地理学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的资料。论文集《人文地理学原理》，于1922年由其学生德马东(E. de Martonne)整理出版，约用1/3的篇幅论述了人口地理学的基本问题，分析了地球上人口分布的差异性及其成因、以及人口流动等，也对非洲、亚洲与欧洲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以及人口状况进行了论述。

白兰士的学生们进一步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地理学思想。在人口地理研究方面，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J. Brunhes)发表了《人文地理学》(1910)，其中

涉及到了人口分布与流动、文明地理与区域地理等。他认为世界水文与人口图对人口地理学极为重要，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的。

地理学家德芒戎(A. Demangeon)晚年对人口分布与迁移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30年代初，他指出地理学家应该研究的4个主要问题中有3个与人口直接有关，即远东庞大的人口数量、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关系、干旱地区国家的农业用水与大城市的增长等。1945年，后人为纪念德芒戎出版了论文集《人文地理学诸问题》(Problems of Human Geography)，收有他1902-1941年发表的文章，书中在通论地理学部分初步探讨了人口过剩问题。

二战后，布朗夏尔(R. Blanchard)利用相关资料分析了城市新问题，即区域首府的作用与人口向城市流动。索尔(M. Sorre)的代表著作是四卷本《人文地理学基础》(1947-1952)，在第四卷研究人类的居住地，包括农业人口等的分布。乔治(P. George)(1950)发表了第一篇反映人口地理认识思想的文章，并于1951年出版了第一本人口地理学教材《法国的经济和社会地理》，他指出人口的分布与经济、社会因素之间联系密切[4]。同期，人口学研究也有较大发展。如朗德利(A. Landry)的《人口概论》(1949)；索维(A. Sauvy)的《人口通论》(1952)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很少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

比较而言，同期德、英、美等国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并不活跃。特别是在德国，尽管拉采尔已经为人文地理学的系统研究指引了方向，但是有部分学者质疑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同时存在的必要性，一些极端学者甚至提议完全将人文地理学排除在地理学之外，从而制约德国人口地理研究的发展。

英国第一部关于人文地理学的著作出现在1902年，即地理学家赫伯森(A. J. Herbertson)的《人类及其劳动》(Man and His Work: 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Geography)，讨论了人口的分布和移动，即各个不同职业集团的人口密度、扩展和迁移。纽比金(M. I. Newbigin)于1912年出版的《人类及其对自然的征服》(Man and His Conquest of Nature)，则论述了“人类集团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地理学的中心问题是“为什么人们在某些地方比在另一些地方容易生活下去”。总之，英国地理学这时期的人口地理学并没有得到重视。

20世纪初期，美国地理学家森普尔(E. C. Semple)才将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概念介绍到美国，她在《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1911)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体质与经济发展等影响；亨廷顿(E Huntington)1915年出版的《文明与气候》(Civilization and Climate)也强调了气候对人类文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1921年鲍曼(I. Bowman)分析了中欧人口的区域差异[5]。1923年巴罗斯(H. H. Barrows)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分布和活动之间的关系是地理学的研究目的[6]。1939年美国地理学家杰弗逊(M. Jefferson)在《城市首位律》(The Law of the Primate City)对世界城市人口分布的进行了比较分析[7]。泽林斯基1950年描述了美国内战前少数自由黑人的人口统计与分布特征，并且试图揭示两种不同黑人群体(自由黑人与黑奴)的空间差异[8]。

受西方近代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早期的地理学者结合当时国内涌现的实际人口问题，开展了一系列人口地理学研究。我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竺可桢于1926年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一度拉开了我国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序幕。对我国人口地理学界而言，3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许多地理学前辈开始关注人口问题，成果也较为丰富。如翁文灏的“中国人口分布与土地利用”(1933)、张印堂的“中国人口问题之严重”(1934)等。特别是1934-1936年，中国人口地理学创始人胡焕庸先后发表了“江宁县之耕地与人口密度”(1934)、“安徽省之人口密度与农业区域”(1934)、“中国人口之分布”(1935)、“句容县之人口分布”(1936)等一系列中国与区域人口地理论著。胡先生终其一生在推动中国人口地理学的发展。至今为止，胡焕庸线依然反映出中国自然地理与人文经济地理显著的地域差异。研究表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并未发生大的变化[9]。

其他国家也开展了少量的人口地理研究。同中国一样，日本长期以来也积累了大量人口资料，但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相对滞后。本世纪初，一些欧美人口地理著作被介绍到日本。日本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发生在1920年，从而引起了研究人口地理学的兴趣。此前已有美国地理学杰斐逊(M. Jefferson)对日本人口分布进行过分析[10]。1926年麦谷龙次在《地理学评论》上发表了《关于人口地理学问题》。之后几年，陆续有大小不同的比例尺地形图出版，从而加速了对人口地理学的研究。30年代

后因侵略战争需要，对人口地理资料更加关注。如及川甚之丞的《日本人口地理》(1932)、石桥五郎的《人口地理学》(1938)等先后出版。而苏联40年代以前，人口地理研究还仅仅是经济地理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后来才慢慢开展人口地理学研究。

这一时期，多期人口普查的数据促使了人口地理研究过渡到定量分析。但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与人口生物论在人口地理研究中影响依然较大，学者过多从自然条件与环境特征来解释区域人口分布与人口密度的差异，仍以描述人口空间现象居多。但是，人口地图制图在方法上有较大突破，即瑞典地理学家德·耶尔(S. de Geer)用大小不同的点来表示人口数量的先进技术[11]。此后，这种方法在一些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在研究范围上，人口地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聚落(城市、农村)地理也开始盛行起来，特别是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丰富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在研究队伍上，美国、中国、日本以及苏联等国家纷纷开展了人口地理研究。应该说，这些都为人口地理学走向学科独立提供了理论与基础保障。

3 20世纪下半叶的人口地理学形成与发展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区域人口地理学研究的论文、系统性著作如雨后春笋，丰富了人口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下两个主要事件加速了人口地理学作为独立学科形成与发展的步伐，第一是美国学者特里瓦撒和泽林斯基及英国学者胡森等人对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提倡；第二是国际地理学会(IGU)长期的推动。

美国人口地理学的起步尽管晚于欧洲，二战后发展却十分迅猛。尤其是特里瓦撒(Trewartha)在1953年美国地理学会年会上强调“人口的数量、密度和特征是一切地理学的基础”[12]，随即在美国地理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开辟了全球人口地理学研究的新篇章，对于开展人口相关研究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相关文献普遍指出特里瓦撒是人口地理学的开创者[13]。

1954年，詹姆斯与琼斯(P. E. James& C. F. Jones)主编《美国地理学：现状与展望》(American Geography: Inventory and Prospect)，其中有一章专门介绍了人口地理学，指出人口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各地区间的人口数量和类型的差异性[14]。中国学者马寅初1957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发表了《新人口论》，引起了中国高层的严重关注。195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巴克利(G. W. Barclay)出版了《人口分析技巧》(Techniques of Population Analysis)，作者从数据统计的准确性、死亡率表、出生率度量、人口增长、迁移与人口分布等方面作了阐述[15]。

1960年代以后，美国陆续有人口地理学的专著出版，最为著名的有地理学家泽林斯基的《人口地理学指南》(A Bibliographic Guide to Population Geography)(1962)与《人口地理学引论》(A Prologue to Population Geography)(1966)。他在《人口地理学引论》[16]中指出，人口地理学应该加强如下三方面的研究：一是描述基于人口数量及特性的地理位置；二是解释人口数量和特性的空间组合与结构；三是阐明人口与其他地理要素的关系。几年后，特里瓦撒也出版了3本力作，分别是《人口地理》(A Geography of Population)(1969)、《发展中国家人口地理》(The Less Developed Realm, A Geography of its Population)(1972)和《发达国家人口地理》(The More Developed Realm, A Geography of its Population)(1978)。

国际地理联合会成立于1922年。1949年便设立了人口专业委员会。此后，苏、美、法、英等国的地理学会陆续设立了人口地理专业组，人口地理课程在一些大学地理专业陆续开设。1980年国际地理大会首次成立了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这次大会讨论了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的城市发展、环境与资源保护等。之后围绕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1996年，在第28届国际地理大会上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更名为人口与环境专业委员会，此次会议主题是“陆地、海洋和人类的影响”，讨论了全球变化下海平面上升对分布在距海岸线100 km范围以内人类活动高度集中地区的影响与对策。

其他国家如法国、英国、苏联、日本、澳大利亚、阿根廷、印度及非洲部分国家纷纷加强了人口地理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或著作。特别是法国女地理学家博若-加尼耶的法文版《人口地理学》(1956-1958)，1966年出版了英文版[17]，这可能是地理文献中第一部人口地理学专著，内容主要涉及人口地理学的定义、人与空间、人口发展史及人口流动等。在英国，有克拉克(J.I. Clarke)的《人口地理

学》(Population Geography)(1965)、《人口地理学和发展中国家》(Population Geography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1971)和《西亚北非人口地理学探讨》(Population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 Geography Approach)(1972)。这里特别要强调克拉克的《人口地理学》，这是第一部英文原著的人口地理学专著[18]。该书内容详细全面，对人口地理学的定义、人口分布、人口密度、人口组成、人口成长、城市与乡村人口、迁移、人口与资源等分别作了论述。后来一再修订出版可见其重要。

20世纪50-60年代，人口地理学还保留着研究人口数量特征、空间分布与地区差异的传统，普遍从地理环境的基本因素与条件对人口数量、密度及构成影响加以描述，通过区域调查与人口统计数据分析人口分布与特定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定量分析较此前已有明显加强。许多国家相继开展了人口统计工作，成立了人口研究机构，人口统计学家也加入了人口地理研究队伍，开始重视人口统计与空间位置的关系。

70年代后，一方面“计量革命”促使人口地理学迈向定量分析、动态模拟的量化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其他社会经济学科的发展也对人口统计等数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一步拓展了人口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空间分析方法已成为人口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这种观点在许多人口地理学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英国，众多人口统计学家异军突起，1971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举办了人口研究组会议(The Population Study Group Conference)，分别讨论了生活水平、迁移与流动性以及人口地理学的一般主题的定量研究技术[19]。里斯(P. Rees)与威尔逊(A. G. Wilson)《空间人口分析》[20](Spatial Population Analysis)(1977)，强调人口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在人口及其变化研究中把空间分析和人口统计学结合起来。伍兹(R. Woods)《理论人口地理学》[21](Theoretical Population Geography)(1982)强调了空间分析方法对地理学的重要性，指出人口地理学就是从空间的角度进行人口研究的科学。

进入80年代，随着计量革命的深入，人口地理学开始同地理学相分离，逐渐偏向人口(统计)学，尤其是强调人口过程与现象，如不同层次的人口迁移与逆城市化，有人称这一转变为人口地理学的“人口革命”。期间，人口学研究的许多新成果与新方法渐渐为人口地理学者所采用，人口地理学研究范围得到了拓展。1979年，伍兹《地理学中的人口分析》[22](Population Analysis in Geography)排除了由特里瓦撒提出的人口地理学范围体系，转而把兴趣转向提高尝试和加强分析技术，并把人口学的3个基本要素，即生育、死亡和迁移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研究方向可以称之为空间人口学。1982年开始，英国杂志《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有关“人口地理学进展”的论题被“人口研究”所取代。美国学者斯内尔(G. A. Schnell)与莫莫尼耶(M. S. Monmonier)在1983年出版的《人口研究：要素、形态及过程》[23](The Study of Population: Elements, Patterns and Process)，主要对人口的空间分布、人口成长、生育、死亡以及人口迁移进行了论述。帕西欧内(M. Pacione)在《人口地理学：进展和前景》[24]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 Prospect)(1986)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人口地理学的特征就是其特有的对人口空间特征的分析方法”。同期重要著作还有黑德(H. Heide)与威利肯斯(F. J. Willekens)的《人口研究和空间政策》(Demographic Research and Spatial Policy)(1984)；伍兹和里斯的《人口结构和模型》(Population Structures and Models)(1986)等。

围绕各种人口问题发表的论文更为丰富。斯提维尔(J. Stillwell)与斯科尔顿(H. J. Scholten)主编的论文集《当代人口地理学研究》[25](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population geography)，收录了1986年在英国牛津举办的关于英国与荷兰两国人口地理学当前研究趋势的论文。该书的内容反映了两国人口研究的3个重要主题。第一个主题涉及了总人口变化的主要要素，即：出生、死亡与国内迁移，以及关于这些组成要素的数据被组合与利用到多区域人口预测方法的历史分析；第二个主题完全聚焦于迁移，包含对三个不同移民亚群(劳动力移民、入境移民与老年移民)的分析；第三个主题关注了人口发展、家庭形成、居所流动性与住房供应之间的关系。康登(P. Congdon)和贝蒂(P. Batey)的《区域人口学进展》[26](Advances in Regional Demography: Information, Forecasts, Models)(1989)，书中收录了15篇由不同作者撰写的关于空间人口学最新问题的研究论文，概述了区域人口学特别是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方法与实践。作者将论文分成4个主题：空间规划的人口信息、地方层面的人口预测、居住与再

分布模型、劳动力市场中的迁移模型。

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加剧了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生态退化、环境恶化及粮食安全等问题的严峻性,人口地理学家逐渐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问题作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这些问题迫使人口地理学家从不同尺度、不同角度,引入其他学科的成熟理论、数理模型和统计分析方法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定量研究。从而迎来了人口地理学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要指出的是,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人口地理学发展道路艰难曲折。建国之初,人口增长问题虽已为学者关注,但后来受政治影响几度停滞。直到80年代初期有《世界人口地理》与《中国人口地理》问世,填补了我国人口地理学研究的空白。中国人口地理学真正走向学科发展是在改革开放后,一些高校相关专业开始设立人口地理学课程,同时陆续有一些人口研究机构与刊物诞生,步入稳定发展阶段。横向比较而言,仍滞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首先在人口地理学教材或著作上,明显少于欧美主要国家,如祝卓的《人口地理学》(1991)、张善余的《人口地理学概论》(1999)等;其次,国内整个人口地理学研究没有学科自身的刊物;最后,对比国际地理联合会等主要国家地理学会而言,中国地理学会直到2005年才设立人口地理委员会。

4 跨世纪人口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领域

人口地理学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前,主要是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开展的人口地理相关研究,内容上以描述人口现象为主,数据多通过实地考察与人口统计等获取,侧重因果分析、归纳法等定性方法。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口地理学步入发展阶段,其地理学的传统曾经偏向人口学、统计学,注重人口统计与分析手段。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资源环境问题的加剧,转为重新审视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空间统计分析基础上,面对新问题与新挑战,开始借鉴经济学、行为学、系统学、空间信息技术等定量研究方法与技术。在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之后,空间、定量分析主导了人口地理学发展。

传统人口地理学家仅研究人口变化的3个组成部分——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进入21世纪,人类正处于一个低生育率、老龄化、健康与照顾、过度消费与饥饿、国际移民、种族冲突与同化、就业与住房、全球变暖、流行病、脆弱与福利等众多人口问题交互影响的时代。人口地理学的研究主题与当前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生态退化及粮食安全等问题紧密相连,涉及面广,以下主要对热点进行总结。

4.1 研究主题与热点领域

4.1.1 生育率与老龄化(Fertility and Ageing)

生育率是人口地理学传统的研究主题。在关注低生育率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探究与生育率相关的领域,如儿童。人口生育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到目前为止,对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地理后果还知之甚少,但这对于人口政策有着重要意义。如亚洲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韩国)生育率已接近甚至低于更替水平,但同时普遍存在生育男婴的倾向[27]。在欧洲,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已下降到历史最低(远低于更替水平),而且这种趋势还在蔓延到更多国家[28]。最近,Boyle在苏格兰进行了生育率差异的研究,发现存在显著的地理变化[29]。在2006与2007年召开的人口地理国际会议上都围绕生育率与儿童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在2006年,探讨了儿童地理学(Children's Geographies)。如Ogawa等对生育率下降与孩子抚养费的关系进行了讨论[30]。

随着人类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人口地理学家中研究死亡率的兴趣降低了,逐渐转向与老龄人群相关的问题,如营养健康、老年群体与流动性。2009年国际地理联合会在瑞典Umeå大学召开了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的国际会议,其主题即为流动性与成功老龄化。此次会议涉及的主题包括老年人群迁移与住所流动对其收入与生活质量的影响。老年人群迁移及其对区域年龄结构的影响,老年人群的空间分布是如何影响代际联系的前提条件,退休迁移与老年人群旅游观光的前提。

4.1.2 流动与迁移(Mobility and Migration)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不断迁移与流动。我们生活在迁移的时代,不管是从人口迁移的方式、数量还是频率上看,都是前所未有的。目前主要有国际移民与国内人口迁移,两者人口流动量巨大。因此,人口地理学较以往更加关注各种尺度上的迁移和与之相关的人口活动及其影响,部分原因在于人口迁移本身就是有空间性的。

在许多地区人口变化的驱动力是人口迁移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地理学者或者直接研究人口迁移，或者间接分析迁移产生的影响。

(1) 生命历程与代际研究(Life Course and Intergenerational Studies) 生命历程视角是人口地理学领域众多研究中的一个统一的主题。生命历程研究主要分析人们部分或整个人生轨迹中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关联。早期的生命历程研究往往调查某一阶段事件对另一阶段事件的可能性的影响。当前，生命历程视角包括流动性、工作、住房、孩子、社会变化与个体发展、变化的家庭安排、社会网络、年龄、一代人、残疾、健康和营养、福祉的不平等以及脆弱性等内容。随着纵向数据源获得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许多复杂的生命历程研究能够检测生命历程的代际方面。生命历程分析已经发展到不只是研究一代人的阶段。地理学研究框架内的代际研究更倾向于调查家庭成员的邻近性[31]与隔代照护问题[32]。

(2) 性别化迁移(Gendered Migration) 1990年代之前，关于女性迁移的系统研究非常少[33]。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生很大改变，女性迁移尺度从区域到国际是主要的迁移群体[34]。性别迁移成为了人口地理学中人口迁移的典型研究内容。男女之间生活和工作状态的不同产生了性别的迁移，同时家庭迁移对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男女群体的影响也不一样[35]。研究表明家庭迁移取决于夫妻双方对性别角色的观念[36]，也与夫妻双方经济收入有较大关系[37]。美、英等国已对家庭迁移进行了详细研究，特别关注迁移对妇女劳动力参与和收入潜力的影响[38]。研究认为，在家庭迁移倾向上存在地理差异，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可以通过劳动力、住房市场和社会网络的空间变化来加以解释。

(3) 居所流动性(Residential Mobility) 人口地理学家对居所流动性的研究有好几十年了。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追溯到罗西(P. H. Rossi)1955年出版的《家庭为什么流动》(Why Families Move)。几十年来，居所流动性领域受空间选择理论和理性行为的微观计量经济学行为模型所支配。居所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较多，如社区居住环境的质量及变化决定着城市内租房者与私房屋主搬迁决策[39]；如家庭收入与住房费用间的差距，以及自身生活状况与配偶关系的变化。频繁的流动与年龄小、子女少与社会关系网络弱有关联，但是与就业关系不明显[40]。Kan从空间维度研究了社会关系网络在家庭居所流动行为的作用，表明较好的社会关系对居所流动具有抑制作用[41]。近来，居所流动性的研究文献发生了“空间转变”，开始关注社区对人们日常经历和机会结构的影响[42]。

4.1.3 人口与脆弱性(Populations and Vulnerability)

人口脆弱性是相对于外部环境而言。进入21世纪，受地质与气候灾害、资源冲突、环境破坏、恐怖主义、战争、流行病、贫困等因素影响，人类脆弱性已为各国政府所重视。一些围绕人口安全、健康的国际计划与行动先后启动，如“地球系统科学伙伴计划”(ESSP)等等。人口地理学家也加入了其中的行列。人口脆弱性与环境这一主题自然也成为人口地理学研究的重点与热点。如古尔德对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与人口脆弱性进行了研究[43]。

国际地理联合会较早关注了人口与环境问题。1996年设立了人口与环境专业委员会；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区域国际地理大会主题之一就是“人口与环境：农村制度可持续性”。环境带来的脆弱性问题日益严峻，国际地理联合会为适应这一形势，在2004-2008年期间成立了人口与脆弱性专业委员会。如2005年人口与脆弱性专业委员会在邓迪举行的年会主题为“感知脆弱性”，并遴选出部分文章在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上发表。2007年人口地理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Geographies)也就人群的脆弱性进行了专题讨论，内容涉及全球变化与环境破坏造成难民数量增加、海平面上升的风险、迁移过程中的脆弱人群研究、艾滋病感染群体等。

人口地理学其他研究主题还包括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种族问题、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饥饿与贫困问题，人才流失问题、以及城市内部的住房、受教育与交通等福利问题。但是这些研究主题通常是交叉分析的，如人口脆弱性与迁移有关，人口迁移与环境的推拉因素有关，老龄群体与流动、健康等关联等。

4.2 发展趋势与前沿领域

从地理学角度看，空间变化、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基于地理位置的人口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3个基本主题——地理学家对人口空间变化感兴趣，意在理解随着地理位置变化，人口及其相关因素是怎样变化的，为什么会不同；地理学家也同样对认识空间变化模式的时间演变感兴趣，地理学

研究的中心议题就是人与环境之间随时间的相互作用,既包括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包括人类社会适应和改变自然环境的方式;第三个主题则主要考虑基于地理位置的人的福祉,以及人口及其相关事物的地理位置与区域特征。

随着当代人口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完善,人口地理学已不再是一个仅由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等组成的主题研究领域了。人口地理学家将空间变化、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基于地理位置的人口这3个主题,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方法融入到人口和地理位置综合研究之中,已成为21世纪人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趋势。毫无疑问,人口地理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续重视空间分析,未来研究进展将更多来自于人口过程、社会问题与焦点问题等之间的交叉研究,这必然涉及地理尺度与地理维度问题。

4.2.1 人口普查数据空间化

精确的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对于自然灾害、传染病损失评估等地理学相关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以往的人口普查中,绝大多数国家进行人口普查时只是考虑一个大致范围的人口数量,如行政单元。而不同区域尺度上较准确的人口数据(如数量、分布及密度等)及其变化对研究社会、经济与环境问题意义重大,如进行栅格尺度研究时,造成其他数据与人口数据在空间尺度上难以相符,影响研究深入。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对人口普查数据空间化在方法上作些尝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44],杨小焕等以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为人口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建立了全国1 km格网的人口数据集[45]。廖顺宝等以土地利用、海拔高度、主要道路与河流作为主要环境因子,以居民点信息作为指示因子,运用多源数据整合技术进行了人口统计数据的空间化[46]。廖一兰等针对采用传统方法解决人口空间问题的困难与不足,设计了遗传规划、遗传算法与GIS相结合的办法,建立了山西和顺县的人口数据格网分布表面[47]。

近些年,人口数据空间化方法的范畴较广,包括分析制图学、地理信息系统(GIS)、网络分析、时空模拟和可视化、空间最优化方法、空间交互模型、基于主体建模、仿真法、点模式分析以及空间计量经济学。但是影响人口分布与迁移的因素复杂多样,当前人口数据空间化方法都有其局限性。2010年恰逢人口普查年,Hugo认为人口地理学家在推进新一轮人口普查数据空间化意义重大[48]。如何实现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其他一些人口数据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反映出来,值得重视和期待。

4.2.2 地理尺度问题

地理学研究对象格局与过程及其时空特征均是尺度依存的[49]。人口地理学家对强调人口现象与过程空间尺度的知识体系作出了贡献。他们倾向关注人口与地理位置的联系,但应更加关注位置之间相互依赖,还包括尺度之间依赖性与选择、转换问题。例如Ellis等发现家庭移民的地理分布不同于个体移民的地理分布,有意采取变化的尺度来比较其研究成果对于尺度依赖的敏感性[50]。

尺度制约了地理表达,因此常常提到尺度适当却很少有尺度正确的提法。某些研究只有在全球尺度下分析才是最有效的,比如那些跟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流行病有关联的问题。其他一些研究显然只关注家族与家庭,如人口生育率。由于尺度分析伴随着地理层级逐步拓展,空间聚类则可以从个人、家庭、社区、城市、地区、国家、国际组织扩大到全球范围。

4.2.3 地理维度问题

人口地理学家眼中的地理位置是一个综合概念,不同于一般人所理解的有边界的区域。地理位置与尺度相关,这个综合概念涉及空间思维的多维度性,包括类比、联合、氛围、可达性、比较、状态、联系、传播、距离衰减、分布、例外、梯度、等级、影响力、相互作用、移动性、模式、接近性、区域、关系等概念[51]。

Newbold提出未来5个有可能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① 人口增长和人口下降;② 艾滋病;③ 国际移民;④ 国际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⑤ 相互影响和冲突[52]。可以说,人类—环境可持续性、人类安全性问题、经济发展和贫穷问题、国际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流动及移民等研究将是人口地理学未来的研究方向。这些关键问题涉及经济、健康、环境、种族、全球气候变化和教育等方面,体现了基础的地理维度。人与环境等要素的脆弱性的地理维度问题是当前和未来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 Johnston R J, Gregory D, Smith D M.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3rd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4.

[2] Jäkel D.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geology and geosciences. Quaternary Res., 2005, 25 (4): 409-431.
[3] Martin G J.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Meynier A. Histoire de la pensée géographique en franc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9.
[5] Bowman I. The New World: 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World Book Co. , 1921.
[6] Barrows H H. Geography as human ecolog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23, 13(1): 1-14.
[7] Jefferson M. The law of the primate city. Geographical Review, 1939, 29(2): 226-232.
[8] Zelinsky W.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free negro in ante-bellum America. Population Studies: A Quarterly Journal of Demography, 1950, 3(4): 386-401.
[9] 葛美玲, 封志明. 基于 GIS 的中国 2000 年人口之分布格局研究: 兼与胡焕庸 1935 年之研究对比. 人口研究, 2008, 32(1): 51-57.
[10] Jefferson M. The distribution of people in Japan in 1913. Geographical Review, 1916, 2(5): 368-372.
[11] De Geer S. A map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 Sweden: Method of preparation and general results. Geographical Review, 1922, 12(1): 72-83.
[12] Trewartha G T. A case for populatio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53, 43 (2): 71-97.
[13] Graham E.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Reflections on Glenn Trewartha's address fifty years 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4, 10(4): 289-294.
[14] James P E, Jones C F. American Geography: Inventory & Prospect. New York: Syracuse Univ. Pr., 1954.
[15] Barclay G W. Techniques of Population Analysis. New York: Wiley, 1958.
[16] Zelinsky W. A Prologue to Population Geograph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66.
[17] Beaujeu-Garnier J. Geography of Population. London: Longman, 1966.
[18] John C. Population Geography. Oxford: Permagon Press, 1965.
[19] Lawton R, Clarke C G. Quantitative techniques in population geography. Area, 1972, 4(2): 125-127.
[20] Rees P H, Wilson A G. Spatial Population Analysi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
[21] Woods R. Theoretical Population Geography. London: Longman, 1982.
[22] Woods R. Population Analysis in Geography. London: Longman, 1979.
[23] Schnell G A, Monmonier M S. The Study of Population: Elements, Patterns, Process.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24] Pacione M.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 Prospect. London: Croom Helm, 1986.
[25] Stillwell J, Scholten H J.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population geography: A comparis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Netherland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26] Congdon P, Batey P. Advances in Regional Demography: Information, Forecasts, Models. New York: Pinter Pub Ltd, 1989.
[27] Park C B, Cho N H. Consequences of son preference in a low-fertility society: Imbalance of the sex ratio at birth in Kore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5, 21 (1): 59-84.
[28] Kohler H P, Billari F C, Ortega J A. The emergence of lowest-low fertility in europe during the 1990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02, 28(4): 641-680.
[29] Boyle P. Population geography: Does geography matter in fertility research?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3, 27(5): 615-626.
[30] Ogawa N, Mason A, Chawla A et al. Declining fertility and the rising cost of childre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2009, 5(3): 289-307.
[31] Bordignon F, Dalla-Zuanna G, Michielin F. Intergenerational residential proximity: An European comparis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Population Conference, Liverpool, 2006: 21-24.
[32] Rogerson P A, Kim 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of the baby-boom coh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cent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 Natl Acad Sci Usa, 2005, 102(43): 15319-15324.
[33] Chant S, Radcliffe S A.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Chant S.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2: 1-29.
[34] Boyle P. Population geography: Transnational women on the mov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4): 531-543.
[35] Cooke T J, Bailey A J.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employment of married women and men.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1): 38-48.
[36] Cooke T J. Gender role beliefs and family migration.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8, 14(3): 163-175.
[37] Cooke T J.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relative earnings of husbands and wiv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3, 93(2): 338-349.
[38] Cooke T J, Boyle P, Couch K et al.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family migration and the gender gap in earn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 Britain. Demography, 2009,

46(1): 147-167.
[39] Boehm T P, Ihlanfeld K R.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neighborhood quality.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2006, 26(2): 411-424.
[40] Fitchen J M. Residential mobility among the rural poor. Rural Sociology, 2010, 59(3): 416-436.
[41] Kan K.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7, 61(3): 436-457.
[42] Clark W. Intervening in the residential mobility process: Neighborhood outcomes for low-income popula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05, 102(43): 15307-15312.
[43] Gould W. Vulnerability and HIV/AIDS in Africa: From demography to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05, 11(6): 473-484.
[44] Dobson J E, Bright E A, Coleman P R et al. Landscan: A global population database for estimating populations at risk. Photogramm Eng Rem S, 2000, 66(7): 849-857.
[45] 杨小唤, 江东, 王乃斌, 等. 人口数据空间化的处理方法. 地理学报, 2002, 57(增刊): 70-75.
[46] 廖顺宝, 孙九林. 基于 GIS 的青藏高原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 地理学报, 2003, 58(1): 25-33.
[47] 廖一兰, 王劲峰, 孟斌, 等. 人口统计数据空间化的一种方法. 地理学报, 2007, 62(10): 1110-1119.
[48] Hugo G.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7, 31(1): 77-88.
[49] 李双成, 蔡运龙. 地理尺度转换若干问题的初步探讨. 地理研究, 2005, 24(1): 11-18.
[50] Ellis M, Wright R. Assimilation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individual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 households. P Natl Acad Sci Usa, 2005, 102(43): 15325-15330.
[51] Gersmehl P. Teaching Geograph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52] Newbold K B. Six Billion Plus: World Populati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 Inc., 2007.

Review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in the Past Century

FENG Zhiming[1], LI Peng[1,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Population geography is a study of the ways in which spatial variations in the distribution, composition, migration and growth of population are related to the nature of places. Long before the last century, there was no discipline called population geography. However, the early substantial relevant investigations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were embodied in the traditional geograph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yet researches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still did not become independent from human geography. The philosophy of anthropogeography of Friedrich Ratzel was inherited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studies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ively develop toward a subfield within geography. It was not until the 1950s was the science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gradually established. Since then, the population geography as a branch subject has gained a persistent and fast development. Bulks of population matters are involved in the scope of population geography in the start of new millennium. Above all, some worldwide concerned and ongoing issues such as fertility and ageing, mobility and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and vulnerability have turned into hot themes lately. In the near future, population and difference, vulnerability, and spatial analysis will still be key interests of population geographers. To cope with the new challenges, the geographic scale and geographic dimensions of population problems should be emphasized, and the methodologies of spatialization of statistical population should be intensified simultaneously.

Key words: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population; population geography; geography; spatial analysis

本文引用格式：
封志明, 李鹏. 20世纪人口地理学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1, 30(2): 131-140.